仿佛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

——李洱《应物兄》读札

◆ 邵 部

李洱终于交出磨砺十三年之久的《应物兄》，这是一部让人发出惊叹的小说。在这里，他锤炼人物、推敲细节、探索形式，建构了一个新的小说世界，以一种李洱式文体书写了当代知识人的世间心和众生相。

小说以应物兄筹备儒学研究院为情节线索，从这个中心人物向外辐射，为当代知识人刻画了一幅全景式的图谱。仅半部小说，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已达五十余位。且不说像应物兄、费鸣等颇费了一番笔墨的重要人物，即使许多点缀性的人物也写得妙趣横生。

《应物兄》人物众多，却能做到同中有异，惟妙惟肖。尤为可圈可点处，是对于“声口”的刻画。其人物之异，异在“声口”，从声口见其性情、气质和形状。写作伊始，李洱就表现出写“说”的精妙。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染有喋喋不休的“话唠症”。这既是费边（《午后的诗学》）、孙良（《喑哑的声音》）职业病的外在症候，也是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时无所适从的病根所在。他们让我们看到，口若悬河反而是失语的最无望的状态。这是独属于的李洱的关于“话语”的辩证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物兄》里，“声口”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对话”，而是被赋予了多种表现形式和意义内涵。讲学论道、日常谈话、学术著作、诗词唱和……很难想象，在一部小说里，我们竟然会遭遇如此多的“双引号”与“书名号”。外观上，不断出现的分隔符好像撕裂了文本，使叙事主线变得凌乱；内在里，这些自成一体的形式却赋予了文本重组的可能，使凌乱的部分有其意义且可以互相沟通。它们将话语权由叙述者转移到人物手中，划定出独属于“知识”的疆域，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内在对话性。梁鸿以“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这种写作模式命名，指出知识之间通过关联性进入叙事话语，结果是“故事逐渐模糊，事实不断衍生，细节淹没了一切，淹没了小说时间、情节，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衍生的意外、关联与不断庞杂的结构空间。”这种认识可谓切中肯綮，指出了李洱实现文本意义增殖的秘法。

这些“知识”营造氛围、塑造人物，却无意承载推进叙事的功能。因此，它们的载体是“言”，而非“事”。可以说，在李洱建构的诗学世界里，“言”的篇幅和地位都超过了“事”。《应物兄》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大可一言以蔽之。但“言”却以不拘一格的形式打开了这个狭小的空间。

语言形式的多样，使得读者稍不留意就会在文本中迷失方向，陷入词语的迷宫。以最规范的学术体例论证并不存在的虚假之物是李洱常用的“诡计”。如关于济州蝈蝈的叙述。这是程济世念念不忘的儿时玩物。在华学明的论文里，它具有一切使人信以为真的外在特征。起源地、习性、发生频率，甚至最后一只蝈蝈“末代皇帝”的灭绝都被清晰地考证出来。所有的形式都是真实的，而对象却是虚假的。这种设计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俏皮话和不经意的清谈，虽是荒诞不经，却闪现着看透真相的睿智。

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应物兄》命名为记言体小说。当谈到现代小说的中国传统时，我们往往将之指认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亦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端。《应物兄》对应的传统似乎并不在这个范畴里。在笔者看来，它的体例与趣味离《史记》和《离骚》为远，更接近于记言体的《国语》。试问，是什么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小说通常的法则是，在从生到死或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结构中，书写一个人的爱恨情仇和事功行止。在这个过程下，人物方才得以浮现。小说里始终是一个在“动”的人，要么是行动，要么是情动。与此对应，“说”在塑造人物、架构小说的过程中所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应物兄》则颠倒了这重关系，转化了记言体的形式，在“双引号”内注入了足以点化小说的内容。“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文体概念，而“传统”的文体却要复杂和广博得多。在“小说”的知识谱系中，后来者也在创造着它的起源。也许，这正是《应物兄》在文体上的意义所在。《应物兄》中有一句对学术明星的嘲讽之语：“他们好像无所不知，就像是站在历史和现实、正剧和喜剧、传说和新闻、宗教与世俗的交汇点上发言，就像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笔者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这句话，并以此指认李洱创作的丰富和博杂。阅读《应物兄》就像是一步踏入了几条河流，同时在这些悖论式的领域里自由驰骋。在这些诸多线索的交汇点上，它展开了对当代知识人的生活实录，亦直抵他们的精神私史。

（李洱：中国先锋文学之后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应物兄》刊载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冬卷），为其最新长篇小说，获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应物兄》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传奇新徽商

四公斤，徐刚倾力塑造——传记文学《歙之情缘》重达

◆ 胡玉琪

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重达四公斤的传记文学巨制——《歙之情缘：周小林传》，我掩卷无语、久久沉默，内心的激动与饥渴相互交织……许久，深深呷了一口茶，缓过气来，复又慢慢展开书页，再读，细读。久违的阅读快感在我心头荡漾。

徐刚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学前辈。先前早已拜读过先生的《艾青传》《梁启超传》等，包括这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大森林》，但都没有读先生这部《歙之情缘》来得强烈。先生用宏大的架构、精妙的语言、华美的文笔、生动的故事，把中国社会近70年来的重大变革作为历史背景，纵览事实，撷取细节，巧妙编织，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成功地塑造了周小林这位多苦多难而又坚韧、执拗、诚挚、仁义的典型新徽商形象。传记文学本不好写，能成功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作品，鲜见。在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撷取歙砚这一冷僻题材去写一个特殊的具有强烈个性的非典型人物则更是困难。

徐刚先生在自序中开篇第一句便剖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写周小林？”“为什么要选择了非我所长的三百砚斋歙砚的题材？”……而在后记中先生完成书稿后心力交瘁地叙述：“自以为写作本书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况且我对传记文学也还稍有心得……但始所未料的是，周小林的传记太难写了，周小林几乎让我招架不住。”随之，先生又释然感慨：“百砚磨小林，小林磨徐刚，如是磨我三年，磨来磨去磨成了这本书。”“就这样，在我风雨飘摇的晚年，又多了一位良师益友，得获歙之情缘！”

可见，呈现在我面前的这部“情缘”正是徐刚先生晚年突破自己并改变风格的呕心力作。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对人物性格的拿捏，精雕细琢的故事，动人心魄的情节，华丽流畅的语言，读起来让人荡气回肠、欲罢不能。“高山抛石”令人垂泪动容；“梨园情”让人艳羡叹惜；“黄山泪”叫人沉重反思；“九问小林”不由令人拍案叫绝……

徐刚先生谓：“周小林是个奇人，痴人，怪人。”如何怪？怎样痴？何处奇？先生只撷取了一段《无上清凉》砚铭：“……远离明星的喧闹，不屑奸商的好恶，全部才华与精彩付于歙石，鞠躬弯腰做一个中国店小二……这就是周小林，他寻一块石，制一方砚，写一段铭，用一片情，迷倒一群人……”徐刚先生可谓惜墨如金，仅116个字就把一个又奇、又怪、又痴的周小林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情怀、磊落侠义的当代儒商。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印刷、制作精良、讲究，用心思将11万字的文本和580多幅图片巧妙镶嵌、穿插，文行图随，不拘一格。是我从未见过的传记文学的另类、文学作品中的奇葩，同时将诗、书、画、砚铺陈于故事、人物之间，融为大美，皇皇之作，俨然一部具有徽文化特色的交响音乐！

近三十年来，笔者尚未看到一部完全令人满意的描写新徽商的文学作品，徐刚的《歙之情缘》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徽文化的传播和新徽商的崛起树立了文学样本。

近又喜闻徐刚先生荣获中国报告文学终身成就奖，无论作品、实力、才情，获此殊荣乃实至名归。我为徐刚先生贺。

不做翻译的作家不是好编辑

——兼评黄昱宁和她的《八部半》

◆ 袁筱一

直接拿了一次活动的宣传语来做这篇小评的题目，倒也不是偷懒，只是倘若要定义黄昱宁和她的《八部半》，可能再也找不到更简洁同时也更中肯的话来了。题目里面，根据词序的不同，当然还包含其他几种可能性，例如“不做编辑的翻译家不是好作家”，“不写作的编辑不是好翻译家”等等。但是重心落在“作家”上，可能要得罪一大批专心写作，心无旁骛，又写了几十年的人，落在“翻译家”上，也会得罪一大批——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概率——并不进行狭义的创作的翻译家。而以黄昱宁的性情，我想应该是断断不愿意的。

其实这句宣传语还有上半句：现代文学的光辉传统。如此我们很容易就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刘半农等等发生勾连。所以说，一边写一边译一边编的确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光辉传统”。但是后来，这样的光辉传统似乎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以为继，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更何况论起对写作以及对现在的文学翻译所应承担的使命的认识，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的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趣的是，尽管“光辉传统”中断了那么久，最近在上海，却是有小范围复兴的趋势。新生代的写作者们，尤其是女性写作者，因为也通外文，在写作之余，会“难免技痒”，涉足翻译。或许除了写作、翻译，她们也还是杂志或者出版社的编辑，重新证明在这三个领域，因着阅读这一共同的底子，完全有可能是共通的。不过，黄昱宁更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相较于周嘉宁、默音，抑或于是，她是翻译编辑在前，写作在后。这就格外需要勇气了。

勇气的第一层意思是，翻译完这么多大家，还有写作的勇气。翻译与原创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翻译总是经过选择的。在众多的作品中，经过两边的出版社、编辑、译者甚至市场的层层筛选，翻译选择的原文本远远不是偶然或者概率。译者，或者编者在挑选原文本时的“眼高”与自己倘若要创作时对“手低”的畏惧便奇怪地纠结在了一起。故法语里有“如果你翻译了别人，你将永远不会被人翻译”的说法。

勇气的第二层意思是，较之于翻译，写作更需要坚持。翻译是一种契约，没有擅自中止的自由，却有很多责任可以推卸；而写作是没有契约的行为，除了自己，没有什么读者会一门心思地等待谁的作品，因而尤其需要说服自己坚持。西方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横空出世，一扫精英文学的威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刷也突飞猛进，报纸杂志一哄而上，文盲比例大幅度缩小的形势。而在更为直观的感官媒介挤压文字的今天，这样的好时代恐怕只有让人羡慕的份。

当然，黄昱宁和她的《八部半》的价值始于勇气，但绝不仅限于勇气。作为同一个圈子里的人，我对她不能说是不了解。可《八部半》还是给了我不少惊喜。在我的想象里，她但凡写小说，应该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加上心理感伤主义的调调，这种固执的印象，就像我判断自己倘若有一天再写小说，一定是学院派的调调——就好像对半个罗兰·巴特再加上半个杜拉斯的戏谑模仿，想象到那样的怪物，实在是让我泄气。然而黄昱宁全然在我的想象之外。《八部半》是八个虚构的中短篇加上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半个”的合集，内容却是覆盖了虚构努力要接近的真实的各个领域：社会必然经历过的令人或沮丧或茫然的现实；人与人之间，哪怕是最亲的人之间的无法沟通；现代技术对我们的冲击以及由此实现的虚构与现实的反转……如果不是小说中人物设定过于“真空”，以至于暴露了我们这一代熟悉外国文学的人对“非典型性人物”的迷恋，还真不见得能够认出《八部半》背后的作者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昱宁，甚至无法截然分辨作者的性别。然而，在作者淡去，故事浮现的那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认出了她喜欢的麦克尤恩，或者阿特伍德的影子，至少是她的趣味。是对叙事的刻意追求留下的痕迹，抑或是语言？有点过于精致，封堵住了巨大的激情。

好在我相信，越是被封堵的激情，就越是值得等待它往峰值去的那一刻。也许终有一天，我们的活动真的要挂出“不做编辑的翻译家不是好作家”的条幅，只要她依然勇敢，依然坚持——小说的技术与艺术，对于翻译家而言，反倒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问题。

新书速递

《浮生》

作者借散文之笔，通过描写和记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给自己带来震动与思考的事件，写出了一连串用诗心对生活不懈的追问。作者怀疑世俗，却又透出对世俗无限的钟爱；在写到细碎日常时有一种不愿停笔的渴望，仿佛不画出生活落叶的筋脉，就不足以在一幅油画中表现林地树木的繁华和更替。其笔尖的脚步不因风雨到来而凌乱急迫，在从容叙事中提出对生活的追问：为什么我只有从别人的生活中能看见自己？

人家的路，为何总是载着我的脚痕？……

书中文字温暖朴素，涵义隽永。作者用一个个细小而特别的故事，串起人生中无可逃避的情境和遭遇，照出自我的底色，看见别人的生活；让读者感受到，在喧嚣世界里我们依然寻求内心的安定与通向未来的力量。

作者刘汀是作家、诗人，曾获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等奖项。

《周迅·自在人间》

多年前，周迅觉得应该为跟拍自己多年的三位摄影师好朋友做一本书，后来先后有六位摄影师加入，包括艺术家叶锦添呈现了《恋爱中的宝贝》《大明宫词》《橘子红了》《风声》等拍摄现场的精彩瞬间，两位国际时尚摄影师斯特凡·塞德那欧和彼得·林德伯格呈现出不同面相、不同状态下的周迅。朋友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机缘，不仅可以记录自己和周迅相处的点滴日常，也可以由此略略探知中国影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长和发展。跟着时代成长，或许是每个人身上都承担着的责任。这本书慢慢变成20多位圈内师友一起为周迅写下的“小传”，关于感情、关于事业，作为彼此间相识一场的纪念。

300张照片，成长的碎片，染上岁月痕迹，痛苦的、自由的、真诚的、缥缈的……没有掩盖原本的模样。这份自在，并非毫无顾忌的自由自在，亦非天生所具，而是在时光的磨练中，慢慢学会与生命相处后的一种坦然。